

当代中国流动人口的特质与成因

李 德 滨

80年代出现的流动人口大潮,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流动。它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社会大变迁的集中反映。本文不但探讨了流动人口的数量、类型和构成,还分析了流动人口的特点和成因,对于正确认识和控制当代中国流动人口有重要意义。

作者:李德滨,男,1944年生,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伴随着社会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发展,中国人口流动空前活跃。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流动人口的总量和范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成为当代最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之一。

一、流动人口及流量

流动人口指的是跨越一定界限、暂时离开户籍所在地并不定期往返户籍所在地的人口,它包括暂住人口(包括暂住半年以上领了暂住证的人口)、当天往返人口和中转人口。

早在50年代初,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就有许多农民流入城市谋生。到50年代中期,又有相当数量灾区的灾民流入城市谋生。从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末,国家通过户籍制、劳动人事用工制等严格控制人口流动,故流动人口数量始终较小。

改革开放大潮加快了中国社会变迁的节奏,社会大变迁又激发着人口流动的加速和扩散,并使之具有了不同以往的意义。流动人口数量增长十分迅速,范围也越来越大。从时间上看,主要从80年代中期以来,流动人口加速增长;从地区来看,沿海对外经济开放地带、工商业城市、交通枢纽、旅游胜地所在的大城市,流动人口尤为突出。据周君玉估计,1985年以前,全国流动人口不足1000万人,1986年流动人口为3000万人,1987年为3000多万人,1988年增至5000万,1989年公安部估计为6000至8000万人,每年大约以30%以上的速度增长。^①另据流动人口方面权威张庆五先生测算,全国1982年约有流动人口3000万人,至1983年增加到4000万,1987年又上升到6000万人以上,比1982年翻了一翻。最近3年,我国流动人口平均每年递增1000万人。^②后一种估算是将途中流动的往返人口和中转人口计算在内的,其推算依据较令人可信。

流动人口大幅度持续增长的状况突出表现在大城市中。张庆五先生在1989年提到,据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沈阳、成都7大城市调查统计,流动人口的平均日流量1984年为327.1万人,占当年常住人口的12.6%,到1987年已增加到620余万人,占城市常住人口的

① 周君玉:《城市流动人口态势、调控机制和对策》,成都市城市科学研究会编《成都流动人口》,成都出版社1990年版,第53—54页。

② 张庆五:《80年代以来的国内人口流动》,《中国人口总论》,中国财经出版社1991年版,第218—222。

比重上升到22.5%，几乎翻了一番。比重最高的是广州市，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之比为1:3。

张文关于7大城市流动人口的统计是截止1987年。1988年的城市流动人口统计可见《关于八大城市流动人口问题的综合报告》。该报告所提到的8个城市，除原7个城市外，又增加了一个西安。该报告提到：上海是目前8个城市中流动人口最多的城市，1988年为140.8万，以下依次是广州（117万人）、北京（111.9万人）、天津（110万人）、成都（53万人）、西安（50万人）、沈阳（50万人）、武汉（30万人）。^①同1987年相比，1988年流动人口持续上升的为广州和天津，下降的为上海、北京、武汉，保持1987年水平的为成都和沈阳。

二、流动人口的类型

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流动人口可被划分为不同类型。

1. 按流入目的或从事活动分类

第一种是将流动人口分为4种类型。

劳务经商型。如建筑施工、临时合同工、帮工杂活、家庭服务、修理工匠、集贸贩卖、商饮服务、招聘及横向业务联系人员。据成都1989年调查，此类型占63%。^②

社会交往型。如探亲访友、求医治病、旅游观光、寄养寄读和过境中转等。据成都1989年调查，此类型占22%。^③

公务文化型。如开会调查、学习进修、文化交流和体育活动等。据成都1989年调查，此类型占14%。^④

无业盲流型。如流氓、行乞、行骗、贩票、扒窃和以“六害”行业为生等。据成都1988年调查，此类型占1%。^⑤

第二种也可将流动人口分为4种类型。

劳务型流动人口。主要包括进城工作的建筑队、装卸搬运队、保姆及其他临时工和市区承包土地的农田包工队4个子类。这类流动人口占武汉市流动人口的总数的60%。^⑥

商贩型流动人口。包括集贸商贩和生意手艺人。这类流动人口为15%。^⑦

公务性流动人口。包括因公出差人员、驻汉办事处工作人员和学习进修人员3个子类，这种类型占15%。^⑧

探访性流动人口。这类流动人口有3个分类：走亲访友人员、求医治病人员和旅游客人3类。探访性流动人口占流动人口的10%。^⑨

诸如此类划分很多，基本相似。但因各类型的内容有差异，故在统计上出现的差异也较大。

2. 按流动人口的流动性质分类

将流动人口的流动性质作为划分标准，可将流动人口分为经济型流动人口和社会型流动人口。

所谓经济型流动人口，是指直接从事经济业务活动的流动人员。其主要部分，一是外来的各业合同工、临时工、保姆等劳务人员。他们主要分布在城市中一些劳动强度大的苦、脏、累的岗位上工作，如建筑、纺织、装卸、环卫等。这种劳务人口是经济型流动人口的主体。

^① 北京市人民政府研究室社会处：《关于八大城市流动人口问题的综合报告》，《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3期，第20页。

^{②③④⑤} 《流动人口对成都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及对策》，《成都流动人口》，成都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

^{⑥⑦⑧⑨} 辜胜阻：《人口迁移和流动研究》，《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1989年第2期，第44页。

如北京市流动人口中从事建筑施工的28万多人,临时工合同工15万多,保姆1.58万;上海仅建筑民工就有29.4万人,占全部经济型流动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广州市建筑、环卫行业的工作岗位50%以上由外来民工顶替。在大城市郊区,由于农业第一线劳动不足,也导致大量外来民工流入,以不同方式承包经营农副业。二是经营型的商贩。从事买卖农村农副土特产品和城市工业品。从绝对量看,在一些大城市少则数万,多则近十万。三是来自农村的个体手艺人。他们多有一技之长,从事服务业、修理业、传统手工业,弥补了大城市人民生活需要的空缺。^①

所谓社会型流动人口,是指非直接从事经济业务活动的流动人员。社会型流动人口,一是开会、考察、学习、培训及各类业务往来人口。这类人口在上海占流动人口的4.4%,在北京达5.2%。二是探亲访友等民间往来的流动人口,在上海达22.9%,在北京为18.1%。三是旅游、就医人口,这类人口呈稳步增长的趋势。此外,从城市到农村及在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流动人口是以社会型为主的。以上海为例,1988年10月20日全市外流人口共34.4万。其中,市区17万。在市区的外出人口中,以经济型为目的的仅占24.3%,其中大多为离退休人员、工人、科技人员。他们从事为外地企业承担技术顾问、咨询、技工等“智力型”经济活动,同外来的“体力型”流动人口形成鲜明对比。相对之下社会型流动人口占绝大多数。其中,探亲访友为第一位(占37.3%),其次为旅游(15.9%),开会考察(11%)居第三位。

80年代,流动人口的性质类型发生明显变化,从过去以传统的探亲访友、民间往来的社会型为主转变为以经济型为主。据上海对居民户、集体户的流动人口调查,1984年探亲访友、因病就医的占首位,为41.6%,经济型流动人口仅占13.3%。而1985年经济型流动人口则陡升至60.4%。至1988年更达63.3%。天津市1985年流动人口中,从事经济活动的仅占28%,1986年已达66%。目前,全国城市流动人口中,经济型流动人口约占60—70%。

3. 按流动人口的滞留时间分类

将流动人口滞留或居留时间作为划分标准,可分为1天以内不居留型和1天以上居留型两类。

所谓居留型,是指在流入地居留1天以上的流动人口。据成都1989年调查,居留型流动人口占87.4%。居留型流动人口又可分为短期居留和长期居留两种:居留1天至6个月内的为短期居留;居留7个月至1年以上者为长期居留。前者占49.3%,后者占50.7%。居留型流动人口的投宿方式可分为四种:旅店人口,包括投宾馆、饭店、旅社、招待所,占10%;居(村)民户中人口,占43.7%,其中租赁居(村)民住房的占21.1%;单位中人口,包括工厂、机关、学校、医院、驻蓉办事机构及看守商店店铺的占15.5%;工棚、露宿及游逛街头的人口占28.8%,其中住工棚的占23%。不居留型流动人口可分两种:一是车站、机场、交通口岸中转、候车的,占37.5%;二是本市郊区(县)当天返回的,占62.5%。^②

4. 按流动人口的流动方式分类

辜胜阻参照国际流动人口分类,结合我国实际,将城市流动人口划分为五种类型。^③

定期性往返型流动人口。这类流动人口的特点是白天在城区工作,晚上回到农村或规律性每周回农村1次。这种人的生活基础在农村,他们的所得利益绝大部分在农村支出。这类

^① 周光复等:《中国人口国情》,中国人口出版社1980年版,第177页。

^② 《流动人口对成都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及对策》,《成都流动人口》,第5、6页。

^③ 辜胜阻:《人口迁移和流动研究》,《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1989年第2期,第44—45页。

流动人口包括在城镇地区乡村企业中工作的工人和集市贸易上的小商贩及其他经营者。

非定期性往返型流动人口。这类人口不象规则性往返人口那样，每天或每周规则性地从城镇地区返回农村。但是他们预期是要回家的。他们的往返不是固定的、规则的。同定期往返人口不一样，这类人口在城市有更多的生活经济基础。但是，他们同样把绝大部分收益花在农村，他们的家庭成员也生活在农村。这部分流动人口主要包括：进城工作的建筑工、搬运工、保姆、商业经营者和其他临时工。

季节性流动人口。这类流动人口是季节性地流向城镇地区寻找工作，以便补偿农业收入的不足。他们的一般规律是，农忙时务农，农闲时进城做工。

目标性流动人口，这类流动人口在特定时间里为特定目标的实现而流进城市，在实现这一目标后便返回。典型的目标性流动人口是进修人员和因公出差人员。目前，我国城市的目标性流动人口具有两大特征：这类人流动的目的具有明确的公务性；这类人主要是属于城镇间的人口流动。

旅游型流动人口。这是一种短期的以探亲访友和旅游为目的的流动人口。其特点是：非经济性；流动方向上的混合性，既有农村流向城镇的，也有城镇流向农村的；流动期限上的短暂性。

5. 按流动人口是否带家眷分类

按流动人口是否带家眷作为划分标准，可分为全家型(即人口性)和单身型(即经济性)。

所谓全家型流动人口，也叫人口性流动人口，即夫妇或带孩子一齐流动，流动是以家庭为单位。

所谓单身型流动人口，也称经济性流动人口，即家庭中的个体到外地流动，流动是以个人为单位。

三、流动人口的构成

据全国性的调查资料估算：从性别构成看，流动人口中的男性居多，约占70%左右；从年龄构成来看，流动人口年龄构成轻，绝大多数是劳动适龄人口，即青壮年居多；从文化程度结构来看，文化水平低的占的比重大，即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为多；从职业结构来看，来自农村剩余劳动力中的从事经济活动特别是从事工业建筑商业服务业的人数居多。

应该看到，流动人口的类型差异很大，而不同类型的构成也有明显区别，胡琪曾以上海流动人口为例，对经济型和社会型流动人口做过简要的对比分析。^①

年龄特点。经济型流动人口基本上是劳动适龄人口。年龄分布集中于青壮年阶段，15至34岁人口占72.9%，其中20至24岁年龄组居第一位，占30.7%；而80岁及以上人口在经济型流动人口中只占3.3%。社会型流动人口，由于活动内容不同，其年龄分布较为分散，15至34岁人口占29.6%，15岁以下的占31.7%，60岁以上的占14.1%。

性别特点。经济型流动人口是一支以男性为主的队伍，男性占70.5%，女性占29.5%。社会型流动人口的性别比就较为均衡，女性略多于男性，占53.5%。

文化程度。经济型流动人口中大多具有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合计占79.4%。社会型流

^① 胡琪：《流动人口日趋活跃》，《中国人口国情》，中国人口出版社1990年版，第178—180页。

动人口中,文化程度比较分散,文盲半文盲与高中、大学人口的比重都高于经济型,分别达18%和20.4%,初中、小学合计占61.6%。

职业特点。经济型流动人口中,原职业为农林牧副渔者最多,占64.7%,工人占13.9%。社会型流动人口中,学龄前儿童与在校学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达34.5%,大多是投亲靠友、寄读的人口,农民和工人分别占20.6%和16%。

显见,类型不同,特点便不同,其构成也不同。伴随着社会变迁,流动人口的类型、构成也随之变化并常常成为社会变迁的指示器,为时代留下社会变迁的轨迹。

四、流动人口的特点

80年代中国流动人口出现了许多新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1. 流动人口的数量增长迅速。1985年以前全国流动人口不足1000万,1989年则达7000万左右。仅以旅游为例,1991年中国国内旅游者可达3亿人次,^①这在中国可以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流动人口已成为当代中国的一个热潮,引起了社会诸方面关注。

2. 流动人口的主体来自农村。从来源地来看,流动人口的绝大部分来自农村。据北京、郑州、鞍山调查统计,在122.6万流动人口中,来自农村的达88.3万,占72%。^②天津1989年11月30日抽样调查,在56234名流动人员中,有88.9%来自农村。^③显而易见,改革开放使农村形成了对人口流动的强大推力。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先导的农村改革,使我国长期存在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明显地游离出来。而农业生产商品化、专业化、社会化又促进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和土地分离。加之人口增长、人均占有耕地减少,现行政策也打破了以往城乡封闭的状态,使农民有了较大的自由度,可以不带户籍进行流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了求生存,求发展,便从四面八方的农村向城市涌进。而城市便成为他们寻求工作和获得较高收入的目标。

3. 流动人口主要流向城市。据盛朗分析,自1984年以来,全国大中城市的流入人口数量日渐增加,尤其是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流入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不断提高。如广州市1984年有流动人口50万,占到市常住人口的20.1%;3年之后,流入人口猛增到88万,占市常住人口的比重也提高到33.2%,增长了13个多百分点。这意味着,在广州市每4个人当中,就有1个属于流入人口。北京市1984年流入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14.1%,1988年提高到23.9%。1984年以来,北京市的流入人口以年平均15.3万的速度递增,年平均增长率达16.9%。^④流动人口向大中城市流动,既反映出城市作为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和信息中心的重要地位和强大吸引力,又反映出城乡之间及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4. 在城市居留时间长期化。据成都流动人口调查,在流动人口总量中,有87.4%的人居留城市。居留时间在2个月以上半年以下和半年以上不到1年的分别由1987年的10.1%和9.7%上升到1989年的12.9%和11.6%,在城市居留1年以上的由44.9%上升到48.1%。

① 《旅游在中国人消费中比重增加,今年国内旅游者可达三亿人次》,《生活报》1991年10月16日。

② 张庆五:《关于城市流动人口问题思路》,《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3期,第52页。

③ 谢白玲:《城市流动人口问题探讨》,《社会科学(上海)》1990年第2期,第73页。

④ 盛朗:《中国流动人口迅速增长的原因及变化趋势》,《中国人口科学》1990年第6期,第43页。

后部分流动人口已成为城市中事实上的居民。^①值得注意的是,流动人口常以城乡结合部为集聚地。一般而言,城乡结合部地处交通枢纽,空闲私房较多,生活费用低于市中心,管理部门相对放松,兼有城市诸如水、电、厕所等基本生活设施,故流动人口在城郊结合部租住房屋较为普遍。

5. 从事劳务经济活动者居多。过去在城市暂住人口中,探亲访友、投靠亲属、治病就医等人员一般都在60%以上,如今在大多数城市已降至30%以下,流动人口的主体已被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所代替。北京、广州、武汉、郑州、太原等市调查统计,在291.7万暂住人口中,从事经济活动的达191.8万,占66%。其中,从事建筑施工的有91.5万,占47.7%;工厂企业民工、环卫工人和家庭雇佣人员等达85.1万,占33.9%;从事商业活动的35.2万人,占18.4%。^②流动人口中从事经济活动人口比重的提高,反映出经济建设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而建筑业之所以成为流动人口的吸收大户,更是与近年来城市建设的大规模展开分不开。1986年第4期的《瞭望》杂志曾以《北京百万流动人口探踪:他们从哪里来,来干什么?》为题,谈到建国后北京的流动人口“由早年的英雄劳模、各地领导干部及探亲访友者,让位于红卫兵,再让位于上访者,现在让位于从事各类经济活动的人员,北京流动人口各类人员构成比例这一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变迁”。流动人口构成的变化,留下了中国社会大变迁的历史轨迹,并预示着中国社会正在步入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空前大发展的新时期。

6. 流动人口的流程愈近流量愈大。从流动人口的流动距离来看,流动人口来自本省本市本县的占大多数。在城镇中,流动人口的位移度是较大的,来源地具有广泛性,即一个城市或社区流入人口往往来自全国各地。以上海为例,流入人口有新疆、黑龙江等边远地区的流动人口,但更多的是来自江、浙、皖三省的流动人口。据武汉、成都、兰州、鞍山统计,在131.3万流动人口中,来自省内的达103.3万人,占78.7%。^③反映了流动人口流程愈近流量愈大的特点,即流出地与流入地之间距离愈近,流入人口愈多;反之距离愈远,流入人口愈少。张运藩先生将此概括为“近距模式”,即流动人口的多寡同流出地流入地之间距离远近呈反比关系。

五、人口流动的原因

80年代中国流动人口迅速增长,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社会大变迁的集中反映。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机制、行为规范、价值观念都发生了巨变。从人口学和社会学角度看,这种大变迁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计划经济、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大转变。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农村使乡镇企业蓬勃兴起,家庭自营企业也得到发展。这必然引发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进镇务工经商,以流动方式投入商品生产、流通领域,大量的采购员、业务员、推销员便应运而生,穿梭于城乡之间。据1985年江苏无锡市调查,仅市郊三县的乡镇企业就有近3万名供销人员经常在外流动。又据1986年浙江温州地区的调查,当地在14万户家庭工

^① 《流动人口对成都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及对策》,《成都流动人口》,第9页。

^{②③} 张庆五:《关于城市流动人口问题的思考》,《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3期,第51、52页。

业、40万从业人员的带动下，又相应出现了14万名农民采购员活跃在各地。^①再一个突出表现，即各个城镇都涌进了修鞋的、理发的、裁剪的、修表的、打家俱的等各种工匠，他们弃农进城务工经商，既繁荣了经济，也方便了群众。这种带有普遍性的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农民弃农务工经商，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中国农村工业化的过程。这一进程的加快，不仅带来了从事商品经济活动主体的增加，而且也带来了流动人口的日益增长。

2. 农业向非农业、农村向城市的大转变。城市化的基本特征，既是城市人口的增长，也是城市特性的增加。在当代中国，由于受城市户籍制的制约，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主要采取的是流动形式，而不是迁移形式。即使如此，农村人口迁入城市的数量也是十分可观的。马侠教授在《当代中国农村人口向城镇的大迁移》中提到，在38年中，中国有6000至7000万农村人口移入城镇。^②与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相对比较而言，大量滞留城镇里边的也还是流动人口。80年代以来，城市化进程加快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城市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各项基本建设、建筑维修等用工越来越多。城市原有的施工队伍已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于是以流动形式出现于各地的建筑行业。据1987年统计，在北京、广州、武汉、郑州、太原5大城市的291.7万流动人口中，从事建筑施工的就有91.5万，几乎占三分之一。据武汉市资料，1975年该市吸收民工参加建筑施工维修的有3.1万，到1987年便增加到18万，增长5倍。^③正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促进了人口流动，推进了农业向非农业、农村向城市的转变。

3. 封闭型人口向开放型人口的大转变。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农业自然经济为基础的自给自足型的封闭社会。安土重迁、安贫乐道是其社会特征之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摆脱了自然经济的束缚，但长期僵化的内部调拨式产品经济仍将生产者束缚在自身地域的活动范围之内，使人口活动处于封闭型状态。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解放生产力，又要解放生产者本身。客观上要求生产者进行合理迁移和流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发展决定了人口必须在国家宏观控制和指导下流动起来。封闭型人口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它妨碍人才流动和信息的交流，妨碍远缘联姻，因而影响民族人口素质的提高。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适应现代化的需要，封闭型人口就必然要向开放型人口转变。

显而易见，没有商品经济大发展，没有开放搞活，没有社会现代化，没有农村上亿剩余劳动力，就不会出现一股股人口流动大潮。因此，探讨当今中国出现的人口流动大潮，是不能离开当代中国社会大变迁的这个广阔背景的。

既然当代中国人口流动大潮的出现有其社会基础和经济根源，那么这个人口流动大潮是怎样生成的呢？由于导致当代中国人口流动的具体原因很多，特别是当我们深入到微观系统中去，就会发现其具体的制约因素很多。这里只就大的四个方面进行剖析。

1. 农村的排斥力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中人多地少劳动力过剩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从1952年到1988年，我国耕地从15亿多亩下降到14亿多亩，而人口从5亿多增到11亿多，人均耕地由近3亩下降到1.33亩。农村人口由5亿增至约9亿，农村劳动力由1.7亿上升到4亿，剩余劳动力达2亿。^④以四川为例，全省人均耕地已不足0.9亩，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全省4500多万

① 袁永熙：《中国人口总论》，中国财经出版社1991年版，第227页。

② 《中国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研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30—31页。

③ 袁永熙：《中国人口总论》，中国财经出版社1991年版，第227页。

④ 田方、张东亮：《人口迁移流动的警钟和对策》，《群言》1989年第9期，第16—17页。

农村劳动力一年中约有一半时间没活干。^①川西坝子民间有首顺口溜：“三个月种田，三个月过年（休息玩耍），六个月找钱（外出务工经商或搞副业）。”这首民谣是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现状的生动写照。这些剩余劳动力需要谋生，需要转移到非农行业。乡镇企业的崛起，成为容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第一道水坝，至今已拦蓄9000万人，但仍有1.3亿农村劳动力需要寻找自己的位置。这种人口与耕地、人口与就业的比例严重失调，产生一股强大的“排斥力”，驱动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寻找出路。这种排斥力还表现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日益扩大，即原材料涨价引起工业品、农用化工产品、百货用品的连锁涨价，而农产品价格上浮甚微，农民投入增加产出下降，农业生产无利可图。李若建曾作过如下推算：“1984年以后，农民从种植业中获得的收入基本上停滞不前，如果按可比价计算产值，以1984年为100，1985年则为98.0，1986年为98.9，1987年为104.1，1988年只有103.9。”^②农产品价格改革滞后，也成为一种排斥力，推动农村人口的外流。由此不难看出，控制流动人口问题说到底是一个怎样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它关系到中国社会能否实现长期、稳定和协调的发展。

2. 城镇的吸引力

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镇特别是大城市，相对于农村来说，工商并茂，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不仅是新兴产业、新兴行业集中的地方，也是人才集结和人员交往的重地。因此城镇就业门路、就业机会比农村广泛得多。首先，城镇建设规模不断扩大，造成基本建设规模迅速扩大，吸引大量农村施工队进入城镇。从1980至1987年，中国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累计达12926.83亿元，平均每年为1615.85亿元。7年间，投资平均每年递增252.31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7.3%。固定资产投资额逐年递增，引起基本建设热潮迭起，造成城镇自身施工队伍紧缺，力量不足，产生对农业劳动力的大量需求。1985年全国从事建筑业的社会劳动者达2069万，其中农村劳动者1130万，占总数的54.8%。至1988年，建筑业人数增加到2527万，其中农村劳动者1526万，占总数的60.4%。^③据江苏省建工部门统计，1982年全省有55万农民参加农村建筑企业，内有18万人进入省内城市施工，有15万人分赴各省参加工程建设。^④其次，一些国家重点建设社区、开发区、特区，对劳动力有强烈需求，吸引着各种各样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据广东省公安厅1988年统计，全省乡镇企业中“三来一补”企业共有劳动力650万人，其中300万左右是外来工。据广东省劳动局统计，东莞有13万外来劳动力，其中广西劳动力占40%，湖南占30%，其余大多是来自四川、江西、湖北、福建的劳动力。^⑤当代流动人口是随着经济建设的重点而移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流动人口常常是经济开发与建设的指示器。再次，城镇中一些苦、脏、累、险的行业存在着相当多的就业“空白”，比如环卫、纺织、采掘等，迫切需要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来补充。成都市全民所有制的建筑公司中，农民临时工占60%左右，国营纺织厂的纺纱、织布工人中的农民合同工也占60%（合同期限三年）。^⑥这种现象在全国极为普遍。这些临时性就业机会，对于经济条件尚不好的并肯吃大苦花力气的青壮年农民是极富吸引力的。

3. 政策的导向力

① 邵立肃：《警钟在盆地敲响》，《四川日报》1986年4月14日。

② 李若建：《中国农村劳动力外流的结构因素》，《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5期，第29页。

③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

④ 张庆五：《体制改革与人口流动》，《公安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第14页。

⑤ 黄杰玲：《白流人口问题浅析》，《广东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第131页。

⑥ 郭付人：《成都流动人口》前言，《成都流动人口》，第3页。

长期以来，我们对人口移动是采取限制政策，主要是通过户籍制和劳动用工制等加以控制。改革开放增强了人们的商品经济观念和竞争意识，也从政策上为城乡人口移动开了绿灯。1984年国务院就农民进入县以下城镇落户问题专门发出通知，打破了长期条块分割、地区封锁、城乡隔离的格局，为城乡沟通拆了“围墙”，打开了“城门”，为“农民大军”进城和“地方队伍出征”提供了可能。这种政策上的导向加快了人口流动的速度，并带来了一系列连锁反映。首先，政策的松动和放宽，使农民有了择业的自由，既可在承包的土地上劳动，又可到城镇务工经商或从事其他经济活动。政策上的这种松动和放宽，犹如蓄水池放开一道闸口，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中一部分释放出来，通过城镇的吸纳而成为当今引人注目的流动人口。其次，政策的松动和放宽，使流入社区得到发展、招工单位得到好处。招工单位正是通过流动人口得到比用当地人员高得多的经济效益。香港《天天日报》在《广东盲流为何连年不断？》一文中，对广东省政府下令所有广东企业不准擅自招请外省劳工规定后仍不断受外省盲流冲击时，曾有这样一条分析：“企业招工的考虑大都以经济效益作为标准。”为此许多企业不执行省政府规定，在他们看来，“特别是外省劳工，不但工资较廉福利少，而且可以选择到优秀的劳力资源，还可以任意解雇，这些都是珠江三角洲的企业，尤其是中外合资企业宁肯违反省政府的規定冒险被罚的原因。”^① 闸门一旦打开，实际控制起来就很难。只要客观上存在着就业机会，存在着劳动力市场，流动人口就会海潮般地涌入。

4. 主体的内驱力

从流动人口的主体来看，获得实际的经济利益，是人口流动的决定性因素。这个经济利益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一是农村劳动资源的有限性，即土地的数量是有限的，其数量变化是缓慢的，这对农业生产的参与和就业带来限制。人均土地少，对于很多地方来说，维持温饱尚可，但要致富却很难。而外出打工则是致富的一条捷径。二是城乡收益上的巨大差异。据抽样调查，全国城乡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异，1979年平均为1.82:1，1987年为1.86:1。^② 从平均数字来看，职工工资是农村劳动力纯收入的1.8倍左右。据成都统计，1989年农村农民人均收入683元，城市居民家庭生活收入，人均1565元。^③ 而流动人口一般来自较贫困的地区，其纯收入要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其流入地一般是经济开发区或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或特区，那里的职工平均工资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样一来，流出地与流入地两地间的收入差异就更大了，往往要有5或10倍的差距。这种两地收入的巨差，对农民有巨大的吸引和导向作用。“要发财，到上海”、“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就生动地反映了流动人口急欲致富的心理。赚钱致富是导致流动个体大流动的基本驱动力。

不难看出，农村对剩余劳动力的排斥，城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引，政策上的松动和放宽又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敞开了走出去的大门，作为流动主体更被致富的欲望所驱使，这四股力的交织与合拍，便形成一股同向合力，推促而成当代中国一股股人口大流动的热潮。

责任编辑：唐 军

^① 冯本清：《广东盲流为何连年不断？》，香港《天天日报》1991年3月5日。

^② 《中国社会统计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1988年版。

^③ 《成都流动人口》，第415页。